

戴

厚

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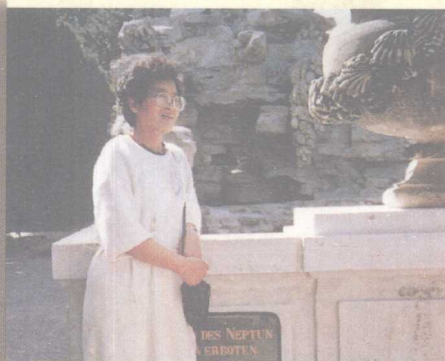
文

集

Fengyuqinghuai

主 编 吴中杰 高 云

Daihouying Wenji



戴厚英文集

风雨情怀

安徽文艺出版社

戴

厚

英

文

集

风雨情怀

安徽文艺出版社

DES NEPTU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厚英文集 第5卷:风雨情怀/戴厚英著.-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4
ISBN 7-5396-1813-2

I. 戴… II. 戴… III. ①戴厚英(1938~1976)②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06231号

戴厚英文集·风雨情怀(上、下) 吴中杰 高云 主编

责任编辑:王玉佩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书刊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9.875

插页:2

字数:750,000

印数:1000

版次: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813-2/I·1692

定价:44.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慢慢熬吧！

——没话找话谈文学戏剧的出路

记不清多少年没进过剧场了。在“样板戏”风行之后，我看过的“非样板戏”是屈指可数的：《肮脏的手》、《假如我是真的》、《母亲的心》。自从搬到这里来住，就一个戏也不曾看过了。差不多成了乡下人，习惯于把到市区叫“去上海”，那感觉真有千里之遥。有时想去看个戏，一想到在车上摇晃那么长时间，还要被挤、被踩，被迫观看各种各样的相骂戏，便再也迈不开脚步了。

不看戏又有什么关系？现在不读书不看报也能过，而且过得更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南北与西东，这是当前最稳妥的生活方式。社会真的向前发展了。

可是，编辑先生来约稿，偏偏叫我谈戏剧的出路问题！我推辞，他们说，当前文学和戏剧不是有相似的状况吗？你就从这相似之处谈起，有啥说啥，拉杂谈来，不拘形式便了。

于是，我决定没话找话。

—

整个民族文化都面临危机，文学和戏剧的困境不过是这种危

机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种表现,一种反映罢了。

文学艺术的发展,像地里的庄稼一样,需要适宜的气候,土壤和种子。这三方面的条件不具备,便会出现危机。

先说气候吧。

文学艺术发展的气候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因素构成的。在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政治气候决定着文学艺术的生命。

不可否认,在“四人帮”粉碎以后的最初几年里,政治气候比较宽松,对文学艺术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那时,当权者、作家艺术家和广大的群众在政治上有一个共同的需要,即清算文化大革命和极左路线,争取国家和人民从一场浩劫中尽快复苏。那时,作家写得起劲,群众看得起劲,当权者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于是乎有“新时期文学”和“新时期艺术”之说。

一个错觉也在“新时期”产生了,以为从此以后文学艺术只有春天没有冬天了。然而十年一轮转,一年仍有四季,又经历几度严寒几度秋,人们渐渐地发现,各种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一致是暂时的,分歧却带有永久性。事实上,文学艺术尽管冲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区,它作为某种政治的宣传工具的命运却没有根本上改变。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作家艺术家企图完全挣脱脖子上的枷锁,可是悬在头上的却是带刺的桂冠。“批判”不再像“新时期”以前那么频繁的严酷,但“引导”却比以前更为细致和有力。坚硬的枷锁变成柔软的锁链,柔软的锁链却更难挣脱。

于是,作家艺术家刚刚炽热起来的胸膛冷却了下来,有没有必要再自讨无趣?

与此同时,各种各样西方文艺思潮被介绍到中国来,使作家艺术家心中压抑已久的文学艺术复归本体的愿望日趋抬头,他们似乎发现了新大陆。他们认为彻底摆脱政治气候影响的途径在于文艺复归到它的本体,把文学艺术与现实世界的各种关系中剥离开

来,在作家艺术家的主观世界里去汲取源泉,在艺术形式的翻新中去寻求自由。于是有各种各样的探索。所谓多元化的局面便出现了。新浪潮一个接着一个,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一闪一闪地升起和降落,天空却是比以前热闹而美丽了许多。可是,这种局面也没有持续多久,星星们一个个暗淡下去了,自由仍然像飘在半空的气球,无着无落。

后来,各种各样的探索也离不开适宜的气候,一元化的政治社会体制对各种多元化的倾向的宽容都是有限度的。新的文艺思潮,特别是现代派思潮在哲学观上向现存的统治哲学提出了挑战,不受到限制是不可能的。艺术上的宽容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宽容度成正比。在现代派艺术的诞生地西方,就有这样的气候。那里的官方和民间都不一定非常欣赏现代派的艺术,可是他们欣赏和鼓励新的探索,新的创造。他们会花钱收买和收藏这些艺术,使之在艺术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文学艺术的土壤自然是它的对象:读者和观众。

中国文学艺术的土壤是贫瘠的。不错,我们人口众多,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作家艺术家能和像我们这样拥有众多的读者和观众。动辄几十万读者的数目常常令西方的同行羡慕和吃惊。可是,现在,我们却越来越感到了冷落,读者和观众越来越远离我们了。有人把这种状况的产生完全归咎于作家艺术家,这并不公正。

精神需要还没有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重要需要,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殚精竭力,这一事实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在挣钱无门的时候,人们或者不得不花一点时间去读书和看戏,可是现在总算有了一点挣钱的门路,谁愿意为“精神”而消耗金钱和时间呢?自然,还有读书和看戏的需要,可是在全民族文化水准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什么样的作品得以流行是可想而知的。严肃文学艺术的创作者难免感到曲高和寡。

气候的多变,土壤的贫脊,都给种子——文学艺术创作的主体

作家艺术家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可惜。在这样的考验面前我们的种子显得过分软弱。

是的,我们已经从冰冻的气候中复苏了,这从我们一次又一次闯过禁区的勇气中可以看到。但是,我们毕竟被冰封得太久了,麻木的神经并没有完全复活,有一部分大概已经永远死去了。

第一,我们的天性是要求自由的,自由对我们甚至比生命还可贵。但是,在追求自由的努力中我们却过多地向客观世界索取,要求保险系数,而较少地向自己的主观世界挖掘潜力。我们习惯于两眼朝天,靠天吃饭。晴天时,我们会欢呼雀跃,脸上挂满欢喜的泪水,而一旦晴空中出现乌云,或者有了雨雪,我们便耷拉下眼皮和脑袋,缩头缩脑,举止失措。我们不能十分安然地对待风云变幻,大声疾呼!收放由人,自由在我!为什么呢?归根到底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完全把自己从旧的体制和旧观念中解放出来。

在文化专制的体制下,作家艺术家的处境是可怜的,但是,那时文学艺术却放在神圣的殿堂里,作家艺术家的作用被无限地夸大,其结果是既可以把他们打入地狱,也可以把他们捧进天堂。而进入天堂以后的待遇却是绝对优厚的。吃官俸,坐官位,一本书可以吃一辈子,红一辈子,除了封建王朝的御用文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文人有这样的待遇?天堂和地狱共有一面山墙,推倒地狱,天堂也要跟着倒塌,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对于这一点,我们之中的很多人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在一些人的心里,地狱固然可怕,天堂却是值得留恋的。枷锁不愿戴,桂冠却难舍。至少“铁饭碗”不忍放弃。所以不能不有所顾忌;不能不去争吃官俸的“专业作家”的位置,不能不去争相当于某某级的文艺官的位置。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端人家的碗怎敢不服人家的管?所以,我们只能争得个半独立。我们所要的创作自由本身就是不健全的。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我们,我们也是人,也要吃饭穿衣,养家活口,而现行的经济体制,出版新闻缺少自由的状况,不能给我们依

靠稿费生存的保证。我们很多人又缺少其他的谋生手段。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我们的弱点，尽一切可能增强自己的独立意识和能力。否则，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一大，我们就撑不住了。

几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又互相作用，文学艺术怎么可能不陷入困境呢？要寻找出路，自然也应该从改善这几方面的条件入手。

一说改造气候，就有要作家艺术家关心政治，干预现实的嫌疑了，而这，是为许多人所不屑的。

可是我却固执。我认为不论什么人都要努力改善自己的环境，参与改造现实的伟大斗争。中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文学艺术家作为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改造现实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有人说，政治与现实斗争和文学艺术没有关系，像刘宾雁那样地进行斗争和写作诚然可敬，却已经超出了文艺工作的范围，有人干脆说刘宾雁写的东西不是文学。

我不想在概念上与这种意见进行辩论。因为概念本来就不能说明复杂的现实问题。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不知有过多少定义，很难说哪一个定义是绝对正确的，事实上，每一个定义都只是一种观念，只能概括一部分文学艺术现象。历史上确有过某一种观念统治文坛的现象，因之也有“正统”和非正统的区别，但是，谁都明白，所谓正统从来都是自封或官赐的。文学与政治有没有关系，或者该不该有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争论了几十年，甚至更久远。可是分出了是非？其实，是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关系，怎么说怎么做都有道理。与政治有关系未必伟大也未必渺小；与政治没关系也未必渺小或伟大。关键在于你和什么样的政治有关系，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为政治服务的路线错在那政治不是作家艺术家自己选择的，而是少数政治家强加给他们的，还在于政治家们完全不顾艺术创作的规律，把文学艺术变成了和刀枪一样的工具。应该否定的是这

两点。曾一度被我们推崇的萨特与政治有没有关系？不但有，而且太密切了！海明威呢？也如此吧！与过去的我们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一切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要改造气候，就要关心现实，积极地以自己的方式投入现实斗争中去。完全离开现实去寻求文学艺术的出路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现实，意思是不一定大家都去像刘宾雁那样去写直接干预现实的作品。虽然这类作品非常必需，而且看起来越来越必需。有人认为这类作品已经过时，只是一种错觉。其实只是群众对这类作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不再欣赏简单的暴露和廉价的煽情，而是要更深刻的思考，更丰富的内涵。《河殤》和许多纪实性报告文字的流行就证明了这种需要。

但是，确实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艺术家去走刘宾雁或苏晓康的道路。文学艺术创作还应该是多元的。然而，不论你站在哪一个“元”上，你的心里都应该像大海一样包容着天下，包容着人民，你的艺术必须植根于这一块土壤上。你可以去追求纯而又纯的艺术，你的艺术却不能纯到可以不要空气不沾泥土。回顾一下中国现代派艺术的萌芽和发展过程，大概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为什么那么打动人心？就因为人们从中感受到了自己生存其中的空气和泥土的气息。然而，以后接连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新诗派呢？在读者中留下了什么？谁也说不上来。没有在中国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现代意识，只在形式上摹仿西方现代派，自然不会有什么出息。

事实已经证明，文学艺术对现实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它既不能祸国，也不能兴邦。但是，事实也同样已经证明，凝聚着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切之情以及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忧患意识的作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人类对文学艺术的需求确实是多方面的，但思想、感情、情绪的交流在这些需求占着第一位，这一点是不应该忘记的。

二

要使文学艺术赖以生长的土壤肥沃起来,有待于全民族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的进一步提高。这不是作家艺术家力所能及的。把作家艺术家叫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实在是过誉了。作家艺术家的灵魂和其他的灵魂一起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吸,同一片土地上生存;作家艺术家和其他人一样为生存而忙碌而经营而必须穿过各种沟沟坎坎,未必个个都是可以为人楷模的“精英”;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观点是正确的,人类的灵魂归根到底是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环境塑造的,而不靠少数“精英”;即便是真有所谓灵魂工程师吧,在几亿人不识字或是准文盲的情况下,又有多大的作用?

所以,我所说的改良土壤只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就是在可能与文学艺术发生关系的那一部分中做一点疏通,挖掘和培育的工作。

文学艺术的创作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它的欣赏对象的制约和影响,这是事实。但是,反过来,文学艺术同样也影响着自己的对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创作的主体是能够为自己创造对象的。从这一点上讲,读者和观众疏远了我们,确实怪我们自己。

大地是实在的

我的心灵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

1980年9月上旬,我结束了在广州为《人啊,人!》定稿的工作,乘飞机回上海。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羊城还是热的。到机场送行的同志们情谊更热。当我在机场的入口处和同志们握手告别的时候,当我站在扶梯上对美丽的羊城回首相望的时候,心里充满喜悦。

这是劳动的喜悦,创造的喜悦,倾吐的喜悦。

整整一个暑假,我没有休息。我坐在上海的小小的书斋里,顶着从窗口射在写字台上的灼热的太阳,从早到晚,一天一天,不停地写,奋力地写。汗水从脸上滴在稿纸上,手臂接触到稿纸,立即留下湿湿的一片。我全然不管。我在劳动,我在创造,我在倾吐……

现在,劳动和创造结出了果实,内心的倾吐听到了回声。仿佛登山运动员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感到疲累,却忍不住张开手臂,尽情地欢呼。

如果从进入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算起,我和文学结缘已经20多年了。然而,我真正理解文学事业、热爱文学工作却是在1978年从事创作之后。

我没有想到,我会在进入“不惑之年”的时候发疯似地写起小

说来。当我开始在一叠废稿纸上写出《诗人之死》的片断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拿出去发表。我不相信自己有创作的才能。青少年时期要当作家的美梦也早已破灭了。我写，只是因为心头淤积了那么多的感情需要倾吐。好像大海到了涨潮的时候，任凭你泥沙顽石也阻挡不住。我面前只不过是一张张废稿纸，可是我看见的却是无数的同志、亲人和朋友，我在对他们说话，和他们交流。小屋里只有我一个人，可是我相信，有人已经听见了我的叹息，我的呐喊，我的欢笑，我的痛哭。

这一堆废纸居然会变成 40 几万字的文稿，被出版社接受出版，完全靠朋友们的鼓励和帮助。他们给我送来了一叠叠的原稿纸，他们一字字一句句地读了我的一稿又一稿，对我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那年冬天，我写得忘记了自己还没有棉袄。一位女友把裁缝请到她家里，赶了一天，把我那件破袄翻新了。

这一切使我懂得，不只有我一个人需要倾吐和交流。创作，是社会的需要。

就这样，我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我心里涌现起一个又一个人物，一股又一股思潮。几十年的经历、见闻、感受和思考，一下子都好像有了生命，长了翅膀，要升腾，要飞跃。我需要不停地写啊！

可是，我是教师，我要教学。写作只能是业余的。我也没有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创作环境。小屋的墙皮已经一片一片地剥落，而且是冬日寒气逼人，夏天阳光普照。二两泡饭，一碗面条，这就是我的基本营养，我不曾幻想有人向我奉献牛奶、面包。

苦吗？我没有觉到。创作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无穷无尽的欢乐。

多么好啊，劳动！多么好啊，创作！多么甜蜜啊，内心感情的倾吐！多么幸福啊，心与心的交流！

我走进机舱，找到了自己的座位。一位老人迎面走来，向我频

频招手。啊，他乡遇故知，他是我的朋友。我迫不及待地向他述说这个夏天的工作和充满心头的喜悦。他倾听着，看着我，含着微笑。微笑中怎么隐藏着几分忧郁？

“你的勤奋叫人高兴，叫人羡慕。可是，你想过没有？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许多曲折。我听说，《诗人之死》的出版又受到了阻碍……”

飞机正在跑道上滑行，我的身心一起感到微微的震动。

好像听见一阵呼啸，飞机离开了地面。一切都变得那么遥远而渺小。我的身体又恢复了平稳。然而心，却还在震动。刚才的喜悦也骤然消失了。

我没有回答朋友。

我把脸紧贴着机窗的玻璃，任思绪在变幻不定的天空中驰骋。

天空是这样的明净、瑰丽、奇异。云在远处翻滚，近处飘飞。一个又一个神秘的世界在我的眼前呈现，幻化，一根飘忽不定的、细细的游丝，牵引着我的思绪，天上地下，左突右撞，难以捕捉。

仿佛有一点惆怅。为什么呢？是因为刚刚从眼前飘去的云雾，还是因为朋友带来的、令人不快的消息？《诗人之死》的遭遇还值得惆怅吗？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为了它的出版所耗费的精神，已经远远超过了写作它的时候所耗费的。然而，这一切比起那地球的转动，人类历史，甚至永远飘泊在天空的云雾来，却还是短暂的呀！

仿佛有一点忧伤。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一片美丽的晚霞突然被乌云所遮没呢，还是因为在创作的道路上发现了荆棘？创作的道路本来就是越野障碍赛跑的跑道。有人前进，有人设置障碍，而且设置障碍的人总是比拼命奔跑的人抢先到达终点，也不会受伤。然而，他们不会有胜利的喜悦，也不值得在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炫耀。胜利永远在于跨越一个个的障碍，不停地向前奔跑。

晚霞在前面铺出一条红色的地毯。那么宽阔，那么深远。沿

着这条地毯走到尽头吧！那好像是一座优美寂静的山谷。一个袅袅婷婷的女郎，撑着一把玲珑剔透的小伞，在山谷中踽踽而行。你是要寻找人间难得的安宁吗？可是却为何又要三步一回首，五步一徘徊？也许你正在进行比较，寂寞的天上宫阙和纷闹的人间世界，哪一个更值得追求？也许你记起了苏东坡的诗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陌生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人只有从别人的存在中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只有从与别人的关系中体现出自己的存在的价值。你离开了纷闹，也就离开了世界；你摆脱了别人，也就否定了自己。啊，你终于转过身来，朝你来时的路上走了吗？

晚霞不敢再去诱惑别人，悄悄地卷起了地毯。天空变得一片灰蒙蒙。

云是青白色的。一条条汇成一团团。一团团又汇成一片片。直到无边无际。好像不再翻滚，不再移动，像一座亘古未化的冰川，厚实、坚硬。似乎，有看不见的神力在进行刀凿斧削，一座座人体雕像平放在冰川里。我看到了一张张画孔，熟悉的和不熟悉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所有人的面部表情都一模一样，平静、冷漠、肃穆。看不见情欲的痕迹，看不见思想的闪光。分不出美和丑，善和恶。他们似乎没有过历史，因而也没有现在和将来。

一阵寒气袭进机舱，我打了一个寒噤，给自己披上一件毛衣。

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那里躺着的究竟是一具具尸体，还是对于活人的模拟？也许它属于过去，可是它却横在我的前面；要说它属于未来，它又是那样的毫无生气和魅力。难道说那就是永恒？那末，现在、过去和将来，以及一切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何必要怀抱生的欢乐、死的恐惧？又何必为成功而骄傲，为失败而叹息？要什么爱憎，争什么是非？为什么要受压迫而抗争，见不平而奋起？

不，不！那不是永恒。永恒应该运行于过去、现在和将来。永恒应该孕育在我、你、他的心灵中，永恒里有真善美，也有假丑恶。

永恒会哭，永恒会笑。永恒是变化而不是僵死。永恒是多样而不是划一。

不不！那不是世界。那只是一块没有性灵的云，趁着日落的黄昏施展自己幻化的本领，吓唬一些神经脆弱的人。

然而，我的心里怎么会有一丝恐惧呢？我怕那云块果然坚硬，阻挡我乘坐的飞机顺利飞行。

机翼上的红五星在黑暗中闪烁，仿佛一只只充满智慧的、无所畏惧的眼睛。机翼呀，我的翅膀！愿你是莫邪的利剑，劈开那欺人的云块，驱走我眼前的虚幻。

冰川就在眼前。我睁大双眼，期待着与它决战。

然而，我不曾眨过眼皮，冰川已经化作一缕缕青烟，小心翼翼而又慌慌张张地从飞机的腋下钻过去，拖着长长的尾巴，断断续续，不成形体。

我笑了。虚幻毕竟是虚幻，经不住真实的撞击。

服务员送过来一袋糖果，我知道，降落的时候就要到了。甜甜的汁液流进胃里，我感到热了，脱下身上的毛衣。

我的脚踩到了大地，一切虚幻的景象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地是实在的。我手里拎的行李是实在的，我腹中饥饿的感觉是实在的，我对与亲人再见的热切期待更是实在的。我的小屋是实在的，我的书桌是实在的，我写在稿纸上的文字是实在的，我在文字中倾吐的感情更是实在的。我遇到的障碍是实在的，我跨越障碍以后的喜悦更实在；我被荆棘刺破的肌肤是实在的，我踩倒荆棘脚下走出的路更实在。

现实是实在的，理想是实在的，记载它们的历史也将是实在的。

啊！我爱这实在的大地。大地给了我忧伤，也给了我欢乐；给了我惆怅，也给了我希望。战胜了虚幻的诱惑，更热爱大地的实在。

喜悦重新涌上心头。这是劳动的喜悦,创造的喜悦,倾吐的喜悦。这喜悦植根于实在的大地,证明着大地的实在。

我热爱我所从事的文学事业。因为它是实在的大地给予我的馈赠,也是我对大地的实在的衷心报答。大地在我心里播下了种子,我把果实奉献给大地。

啊,大地! 为了你,我将不停地倾吐,不懈地劳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的这两句诗在我看来是实在而非朦胧。

1981年的9月,我为了新的创作,再次登上沪广线的飞机,飞到羊城。我仍然坐在机窗边的座位上把脸紧贴着玻璃,然而,我没有再看见那些奇异而虚幻的世界,因为我不再仰脸观望天上的云,而是贪婪地面对着大地。我在天空中进行短暂的翱翔,只是为了更广泛、更深入地接触大地。

大地是实在的。我要一步一步地在大地上行走,留下实在的脚印。

我寻求吐露的机会

我欣然接受“编辑与我”这个栏目的约稿，因为我心里怀着对许多编辑感谢而正在寻求吐露的机会。

在一次演讲会上，一个听众递了个条子给我：“请问，您是怎么和编辑先生们打交道的？”写条子的人好像不只一次地在编辑那里碰了壁，对编辑怀着成见了。确实，报刊上揭露过一些事实，说明一个无名小卒发表作品的艰难，的确有一些编辑并不怎么高明和正派。但是，请让我诚心诚意地说一句套话，我们的编辑绝大部分是好的！至少，我很幸运，我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好编辑。没有他们，我不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没有他们，我的创作也不会坚持下来。

我第一个难忘的编辑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老编辑左泥。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与他有很大的关系。1978年秋天，我由于对历史和人生的思考，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感情冲动，便自己在一堆废纸上涂抹起来。一口气写下了20几万字，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我并没有想到要写小说，更没有想到要成为小说家。当时，我正对莎士比亚感到浓厚的兴趣，因而想重学英语。所以，我写完了那20几万字，心里郁结的感情流通了，便不再管它，又去干别的事了。一位老朋友看了这一堆东西，觉得有它的动人之处，劝我改出来拿去发表。我还犹犹豫豫，我对自己能不能写小说，实在缺乏信心啊！